

浙江大学古史求是丛书

梁太济文集

史事探研卷 下



上海古籍出版社

浙江大学古史求是丛书

梁太济文集

史事探研卷 下



上海古籍出版社

关于金末元初的汉人地主武装问题

1210年,蒙古开始攻金。次年,先锋入居庸关,抵中都城下,长城以北金所属州县,无不残破。1213年秋,又分兵三路大举南下,凡破金河北、山东、河东九十余郡。次年春,三路兵还,屯大口围迫中都。金纳女、币求和,蒙古退兵。五月,金迁都开封,中都遂于1215年五月为蒙古攻占。此后,蒙古主力西征,金苟延残喘近二十年,直至1234年正月终于灭亡。

“有金南渡,河北群雄如牛毛”。^①“拥兵者万焉,建侯者万焉,甲者戈者骑者徒者各万焉,鳩民者保家者聚而为盗贼者又各万焉,积粟帛金县子女以为己有者,断阡陌占屋宅跨连州郡以为己业者,又各万焉”。^②蒙古攻金战争期间河北各地汉人地主武装的兴起,以及随之而来的汉人“世侯”的割据统治,先后历时半个世纪,是一个值得注意的重大历史现象。本文拟从兴起条件、政治动向、作用、职能、内外矛盾和削夺经过等方面,对这一时期的汉人地主武装问题,作些粗浅的探讨。

① 魏初《重修北岳露台记》,《青崖集》卷三。

② 郝经《万卷楼记》,《郝文忠公文集》卷二五。

战争的破坏是异常严重的。蒙古铁骑所指,“两河山东数千里,人民杀戮几尽,金帛子女、牛马羊畜皆席卷而去,房庐焚毁,城郭丘墟”。^①金军对百姓的残害,也与战斗力的丧失成正比。率之应敌,“在途则前后乱行,顿次则排门择屋,恐逼小民,恣其求索”;^②溃败奔逃,更是一路争相攘夺,“剽掠成俗”。^③腐朽的金朝官军“临战辄北”,于是遂“但为清野计”,^④事无缓急,惟期速办,甚至即将成熟的禾稼,也都要强行犁翻焚毁。“百姓耕稼失所”,“人无所得食”^⑤的严重状况愈益严重,“以致平民愈不聊生”。^⑥

南迁以后,金户口日耗,军费日急,赋敛益横。“加赋数倍,预借数年”,“括粟、闾余,一切掊克之政,靡不为之”。^⑦民不堪命,阶级矛盾更加激化起来。陷于“不为人所鱼肉,必转死沟壑”绝境的“元元之民”,^⑧在在揭竿奋起。“群盗纵横”,“土寇蜂起”,“盗贼充斥”的记载,不绝于书,遍及东起山东,西至陕西的广阔地域。山东

① 《两朝纲目备要》卷一四宁宗嘉定七年七月乙亥“金人告迁于南京”条。

② 《金史》卷一〇九《陈规传》。

③ 元好问《龙虎筠寿神道碑》,《遗山先生文集》卷二七。

④ 《金史》卷一〇九《许古传》。

⑤ 《金史》卷一二二《从坦传》;《元史》卷一五一《王善传》。

⑥ 《金史》卷一〇八《侯挚传》。

⑦ 《金史》卷四六《食货志》。括粟始于中都受围。时粮运道绝,下令括粟,“户存两月,余悉令输官”(《金史》卷一〇七《张行信传》)。后各地竞相仿效。如河东,兵革之余,疲民稍复,“贫无依者俱已乏食,富户宿藏亦为盗发”。在这“绝无而仅有焉”的情况下,“潞州帅府遣官于辽、沁诸郡搜括余粟,悬重赏诱人告讐,州县裨帅府,鞭箠械系,所在骚然”(《金史》卷一〇八《胥鼎传》)。闾余:兵后河北大饥,“观、沧等州,斗米银十余两,殍殍相属”(《金史》卷一〇八《侯挚传》),绛、解二州,“村落之民皆尝被兵,重以连岁不登,人多艰食”(《金史》卷一二二《从坦传》)。而金廷却“以一家之民自限南北”(《金史》卷一〇九《陈规传》),于沿河上下“邀阻粟麦,不令过河”(《金史》卷一〇八《胥鼎传》)。后虽“许贩粟北渡,然每石官余其八”(《金史》卷一〇八《侯挚传》)。

⑧ 王恽《李让墓碣铭》,《秋涧先生大全集》卷六〇。

的红袄军,不过是其中最著者。

金宣宗南迁途中,乱军溃去,兵势益弱。遂尽徙诸路军户百万余口于河南,^①并尽以河朔战兵三十万分隶河南行枢密院及帅府。^②山东西之间,“吏士守者或降或死且尽,不能成军”,^③而金廷“止欲以重兵屯驻南京以自固,州郡残破,不复恤也”。^④州县机构日趋瓦解。“自兵兴以来,州县残毁,存者复为土寇所扰”,^⑤“州县吏多乘乱贪暴不法,民往往杀令丞及属吏”。^⑥所谓“河朔盗起,郡县守宰委印绶去”,^⑦“山东被兵,郡县望风而遁”,^⑧河北诸路,“州县官往往逃奔河南”,“多求河南差占以避难”,^⑨表明了普遍瓦解的严重程度。于是,“河北、河东、山东郡县尽废”。^⑩

蒙古攻占中都,成吉思汗北归,授札八儿黄河以北、铁门以南天下都达鲁花赤,与诸将守中都。^⑪1217年八月,封木华黎太师、国王、都行省,承制行事,授以经略汉地全权。木华黎乃建行省于燕云,以图中原。^⑫在此以前,蒙古对汉地只是每年发动一次军事进攻,“秋来春去”,1218年九月攻下太原后,始“招民耕稼,为久驻之基”。^⑬因此,金方认为:“河朔受兵有年矣,向皆秋来春去,今已盛暑不回,且不嗜戕杀,恣民耕稼,此殆不可测也。”^⑭虽然蒙古对汉地

① 《金史》卷一〇九《陈规传》、《许古传》。

② 《金史》卷四四《兵志》。

③ 虞集《汪氏世家勋德录序》,《道园学古录》卷六。

④ 《金史》卷一〇六《朮虎高琪传》。

⑤ 《金史》卷一〇九《陈规传》。

⑥ 《元史》卷一五三《王守道传》。

⑦ 张起岩《耿福先世墓碑》,《畿辅通志》卷一六九。

⑧ 《金史》卷一二一《和速嘉安礼传》。

⑨ 《金史》卷一〇九《许古传》,卷一四《宣宗纪上》贞祐三年三月己卯纪事。

⑩ 刘因《段直墓碑铭》,《静修先生文集》卷一六。

⑪ 《元史》卷一二〇《札八儿火者传》。铁门,指居庸关。“金人恃居庸之塞,冶铁锢关门,布铁蒺藜百余里,守以精锐”,故名。

⑫ 《元史》卷一九《木华黎传》。

⑬ 《金史》卷一一一《古里甲石伦传》。

⑭ 郭文振语,见《金史》卷一〇八《胥鼎传》。

的态度有了带根本性的改变,但在此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除了在某些战略要地屯驻军队和派遣达鲁花赤外,它在河朔各地的统治机构,仍然未能有效而健全地建立起来。

蒙古军长驱直入,如风行电扫,靡不破灭;各地百姓又所在奋起,保砦阻险,攻掠郡县。在这种情况下,“衣冠世族,强者戮,弱者俘”,^①他们的身家财产无例外地受到严重威胁。原先,北方汉人地主豪绅的统治意志和剥削收益是由金朝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集中维护的,现在,既然“河朔为墟,荡然无统”,^②“纲倾维崩”,^③历来维护其阶级利益的金朝州县机构已形瓦解,他们也就不得不纷纷起来另行寻求“自全之计”或“自图富贵”。^④北方汉人地主豪绅,大抵多为“里中大族,家资巨万”。^⑤张柔能“聚宗族数千家”,^⑥程琢曾“以私财募集壮士二万”,^⑦可证。他们在当地有一定威望,“乡之人倚之以为重”,^⑧并用各种形式对乡里百姓进行控制。史载当时“河朔诸郡结清乐社四十余,社近千人,岁时像佖而祠之”,^⑨这四十余清乐社就是受史家左右的民间组织,所以史天倪得以“选其壮勇万人为义兵”。^⑩王兴秀“撼三十余村之民”^⑪迎降蒙古,其影响之大也可想见。此外,灾难深重的北方人民,强者是奋起斗争了,弱者却也往往投附有力者以求庇护。这样,“会诸族、集

① 黄潛《傅进墓志铭》,《金华黄先生文集》卷三八。

② 刘因《郭弘敬墓铭》,《静修先生文集》卷一七。

③ 魏初《重修北岳露台记》,《青崖集》卷三。

④ 黄潛《傅进墓志铭》,《金华黄先生文集》卷三八;姚燧《王兴秀神道碑》,《牧庵集》卷二一。

⑤ 段绍先《史进道神道碑》,《畿辅通志》卷一六六。

⑥ 王磐《张柔神道碑》,《畿辅通志》卷一六八。

⑦ 《金史》卷一〇〇《完颜伯嘉传》。

⑧ 魏初《重修北岳露台记》,《青崖集》卷三。

⑨ 《元史》卷一四七《史天倪传》。史伦为史秉直之父,史天倪之祖。

⑩ 《元史》卷一四七《史天倪传》。

⑪ 姚燧《王兴秀神道碑》,《牧庵集》卷二一。

乡人豪壮”，“据害以御侮，立保障以生聚”，“各以力相雄长”^①的汉人地主武装，就应运而起于齐鲁燕赵之间了。

二

在这些应运而起的汉人地主武装中，除了一部分纯属“避兵”以外，大都是为了同“寇盗并兴”相对抗而纠集的。面对蒙古“兵入中原，金徙都汴，河朔盗起，郡县守宰委印绶去，民莫能相保”^②的局势，真定府藁城王善告里人曰：“今兹丧乱，我辈不有以协同保聚，则为人所鱼肉矣！”众款服，推之为冠，累功主本县簿。^③宁晋县人聚而谋曰：“时事如此，吾侪欲保全家室，宜有所统属。”乃相与推王义为长，摄行县事，寻号都统。^④深州束鹿父老子弟，亦推耿福“摄县政保庇一方”。^⑤隰州城破，惟州倅独存，逃匿他境，“群不逞之徒，乘乱剽掠”。州人曹元，“以资雄乡里者累十数代”，遂“具牛酒集壮士得千人”，“安集境内，还倅于州，群党破散，遗民赖以安”。^⑥景州蓨县贾德扬言要乘乱“掇取富贵”：时“群盗蜂起河朔，在冀部滋甚，汹汹器混”，贾德“慨叹垄首曰：‘大丈夫生世，不能除暴剽乱，建勋名于时，掇取富贵，戴履两间，宁无愧怍！’群侠小壮其言，恃其勇，往往依附为用”。为州将所知，自白衣署故城县丞。^⑦此外，如涿州定兴张柔“聚宗族数千家，辟西山东流塌，选壮

① 《元史》卷一五一《邸顺传》；虞集《曹文贞公文集序》，《道园学古录》卷三一；魏初《卢德元行状》，《青崖集》卷五。

② 张起岩《耿福先世墓碑》，《畿辅通志》卷一六九。

③ 李治《王善神道碑》，《常山贞石志》卷一五。上文为：“乙亥，岁荐饥，人相食，盗蜂起。公谕里人曰……”

④ 《元史》卷一五一《王义传》。上文为：“金人迁汴，河朔盗起，县人聚而谋曰……”

⑤ 张起岩《耿福先世墓碑》，《畿辅通志》卷一六九。

⑥ 元好问《曹元阡表》，《遗山先生文集》卷二九。倅，副也。州倅，指州同知。

⑦ 王恽《贾德行状》，《秋涧先生大全文集》卷四七。

团结队伍,以自卫护”,^①沃州高邑高添禄“纠集义旅,抚安遗黎,内守外攘,以鸠完复之功”,^②宁晋李让“团结乡豪,游猎陆泽荆蒮间,以保庇井邑为事”,^③大名府元城梁千“率众列栅守乡土”,^④南乐杨铁枪“聚众保乡里”,^⑤济南府历城张荣“率乡民据济南黄堂岭”,^⑥泽州晋城段直“率乡党族属为约束,相聚以自守”,^⑦凤翔府岐山王钧“倡集乡兵万人,自将壁拙山,后移壁三棱堡”,^⑧都无一不是为了同“寇盗”对抗才纠集的。

王善任藁城主簿,“抚字填压,近者以恬,远者以肃”;^⑨贾德为故城县丞,“设方略,穷根株,破机牙,擒捕招谕,不数月,寇难荡平”。^⑩汉人地主武装“保庇井邑”,“除暴剽乱”,用的就是抚字招谕、擒捕镇压这两手。王钧“侦得贼巢窟,纵奇击之,擒张嵩北山,斩安和扶风,遣辩士说降梁七兄弟乾州,枭杨政马超山,磔线张汧阳,并将其众”,^⑪即为一例。红袄军首领彭义斌渡河西进,大名“城

① 王磐《张柔神道碑》,《畿辅通志》卷一六八。上文为:“金贞祐间,河朔扰攘,土寇蜂起……”

② 王若虚《高显墓碣》,《溇南遗老集》卷四二。上文为:“当再罹兵火之后,寇盗并兴,道路榛芜,城邑颓废,而能……”

③ 王恽《李让墓碣铭》,《秋涧先生大全文集》卷六〇。上文为:“贞祐初,河朔失守,所在寇盗充斥,日相吞噬。公慨然辍耕垄上……”

④ 袁桷《梁桢神道碑》,《清容居士集》卷二六。上文为:“当金亡时,傍邑盗起侵掠……”按此处“金亡”指金南迁。

⑤ 《元史》卷一五二《王珍传》。上文为:“金末丧乱,所在盗起……”

⑥ 《元史》卷一五〇《张荣传》。上文为:“金季,山东群盗蜂起……”有莱阳人姜椿,“以财雄乡里”,时亦“避杨安儿乱,来水寨依张侯(荣)以居”(赵孟頫《姜彧墓志铭》,《松雪斋文集》卷八)。

⑦ 刘因《段直墓碑铭》,《静修先生文集》卷一六。上文为:“甲戌之秋,南北分裂,河北河东山东郡县尽废,兵凶相仍,寇贼充斥,公乃奋然兴起……”

⑧ 姚燧《王钧神道碑》,《牧庵集》卷二一。上文为:“幸大军去,而群盗复起,岐雍之郊,百千为曹,以剽发财粟为业。……于时行省开府长安,累调军诛之不能平。长安路绝,而生齿益耗矣……”

⑨ 李冶《王善神道碑》,《常山贞石志》卷一五。填,通镇。

⑩ 王恽《贾德行状》,《秋涧先生大全文集》卷四七。

⑪ 姚燧《王钧神道碑》,《牧庵集》卷二一。本文论述汉人地主武装的兴起及其活动,限于河北、河东、山东地区,有关辽东、陕西、河南的情况,概不涉及。此处两次引用《王钧碑》,因为内容比较典型,是唯一的例外。

中大震”，梁千“搜其首乱者诛之”。^①藁城“剧贼傅二，暴甚蹻跖，血蹂旁郡”，王善“亲扑讨，歼焉”。^②易州涞水“义军都统”何渊“尝为山西贼所袭”，其子何伯祥“与十二人俱，冒险捷出，以复父仇，杀掠数百里，破灵邱、奉圣、安水诸堡寨”。^③汉人地主武装在运用擒捕镇压这一手时，其阶级报复的残狠，实骇人听闻。济南府“有盗栅历城南山中”，郡邑不能制，章邱刘鼎“独从一二人直登其栅，喻以祸福，贼惧”，从之降。^④易州“群盗并起”，赵柔“单骑遍入诸栅，说降其众”。^⑤段直以众降蒙古，任泽州长官。蒙古“以泽冲隘，别置守兵，久之，山民不胜其横，往往自弃为群盗”。直上言：“愿罢守兵，请身任诸隘，保其无虞”，从之，“群盗遂息”。^⑥汉人地主武装运用抚字招谕一手的伎俩，也颇为狡诈阴险。

“河北诸路，以都城既失，军户尽迁，将谓国家举而弃之”。^⑦这种心理在河朔地主豪绅中具有相当普遍性。他们纠集地主武装同奋起斗争的人民对抗，由于阶级地位相同，态度几乎是一致的。可是，对于还在北方各地你争我夺的新兴的蒙古和没落的金室，态度就不同了。地主阶级已经不是铁板一块，而是处于激烈的分化之中，表现出各种各样的政治动向。

立即率众投附，依仗蒙古统治者作为新的主子，借以维护其利益并提高其地位的地主豪绅，颇不乏人。1217年八月，“蠡被围，太

① 袁桷《梁祯神道碑》，《清容居士集》卷二六。

② 李治《王善神道碑》，《常山贞石志》卷一五。

③ 郝经《何伯祥神道碑》，《郝文忠公文集》卷三五。

④ 程钜夫《刘鼎神道碑》，《雪楼集》卷一九。《碑》又云：“金季丧乱，民多失业……乃推财发廩，赈乏食饥，远近疏戚皆赖焉。已而寇盗四起，骨肉不相保，有壮士五十人来从公，愿为守卫，问之，乃尝所周恤者。故终丧乱之世，家无一日之忧者，五十人之力也。”此五十人当即刘鼎所纠集的武装力量的核心。

⑤ 《元史》卷一五二《赵柔传》。

⑥ 刘因《段直墓碑铭》，《静修先生文集》卷一六。

⑦ 《金史》卷一〇九《许古传》。

守铁哥婴城自固，民懍懍崩角，莫知所属，欲鸟兽散”。博野史忠，“世服井亩，以孝悌相传”，约众合谋曰：“金驾而南，委河朔去，州又自顾不暇，事势至此，吾辈将安所托？正有畏天顺时得全性命为计之上，不然，何为束手俟死！”遂率孟庄、铁千、两河、夏村等老稚百余人持牛酒诣木华黎行帐投附。^①同县王兴秀，父祖“皆农蠡之博野宋村”，闻兵将至，曰：“丈夫生三十年而劳苦耒耜，屈压极矣。今已委身饵敌，暴骨草野，且吾君已弃民，民尚谁死哉？吾有自图富贵耳！”于是“撼三十余村之民”“将壮士数百辈”，出蠡疆迎两大帅刘伯林、肖也先降。^②早在1213年冬，出于同样动机，即有大兴府永兴史秉直“率里中老稚数千人诣涿州军门降”，^③并在投降之际组织“义军”随从征讨，后来成了河北地区最显赫的地主武装势力。至于那些为避兵或避“盗”而纠集的武装，一与蒙古军接触即率众降附的，更属比比皆是。

与此相反，“河北所在义军官兵，坚守堡寨，力战破敌”，^④或者“介于强敌之间，率创罢之民而为城守计，百诱而不变，百战而不沮，人事既穷，与城俱陷”^⑤的人，亦颇众多。

不过，更普遍的情况却是如完颜伯嘉所说：“自兵兴以来，河北桀黠，往往聚众自保，未有定属。”^⑥古里甲石伦也曾提到：“始敌入河东时，郡县民皆携老幼徙居山险，后虽太原失守，而众卒不从，其意谓敌不久留，且望官军复至也。”^⑦特别是那些实力不强影响较小

① 王恽《史忠行状》，《秋涧先生大全文集》卷四七。

② 姚燧《王兴秀神道碑》，《牧庵集》卷二一。

③ 《元史》卷一四七《史天倪传》。《传》又载：史天倪“大安末举进士不第，乃叹曰：‘大丈夫立身，独以文乎哉？使吾遇荒鸡夜鸣，拥百万之众，功名可唾手取也！’”

④ 《金史》卷一一三《完颜赛不传》。

⑤ 元好问《赵天锡先莹碑》，《遗山先生文集》卷三〇。

⑥ 兴定三年（1219）奏疏语，见《金史》卷一〇〇本传。

⑦ 兴定三年（1219）二月奏疏语，见《金史》卷一一一本传。

的武装集团,更是“人怀顾望”,“昧夫依于”,^①像李让那样“盖有所需以明归附之志”^②的人,实在是很多的。^③或者由于“军力不足备敌,而人无所逃死”,表面归附蒙古,实际仍在观望,所谓“民人堡聚,多为胁从”而“诖误”者,^④当也不在少数。

地主武装彼此间“一愤一兴,迭为雄长”,“皆事屠并争地杀人”;^⑤各支地主武装内部,则如保州清苑李义之所经历:“从杨甲立棚保南,甲为李丙所害,乃慨然以义动众,共杀丙以复所事仇,其众遂推为长。”^⑥从而给混乱的社会增添了无穷的混乱,同时在混乱中也出现了在一定场合能号令各个武装集团的头面人物。如易州涑水赵柔,“金末避兵西山,棚险以保乡井。时刘伯元、蔡友资、李纯等亦各聚众数千,闻柔信义,共推为长。柔明号令,严约束,重赏罚,为众所服”。^⑦这些头面人物的向背,往往带来巨大影响。尤其是像严实那样“据上流之便,握劲锋之选,威望之著,隐若敌国”的人物,虽然也在观望,甚至朝秦暮楚,投机反复,其影响却也更为巨大。因为在“豪杰乘乱而起,四方之人无所归命”的情况下,“人心所以为楚为汉者”,是都要“倚之以为重”的。^⑧

① 李治《董俊神道碑》,《畿辅通志》卷一七一;王恽《朱楫世系碑铭》,《秋涧先生大全文集》卷五二。

② 王恽《李让墓碣铭》,《秋涧先生大全文集》卷六〇。

③ 如王恽《朱楫世系碑铭》所记朱楫兄弟的态度,也是这样:“贞祐初,金弃燕南渡,所在豪强乘乱而起,一愤一兴,迭为雄长,人昧夫依于,楫与弟存乃集乡义年少团大望山以自保。”见《秋涧先生大全文集》卷五二。

④ 元好问《周鼎墓表》,《遗山先生文集》卷二二。

⑤ 郝经《贾辅神道碑》,《郝文忠公文集》卷三五。

⑥ 刘因《李仁祐先生碑》,《静修先生文集》卷一六。张柔的经历十分相似,不具录,见《元史》卷一四七《张柔传》。

⑦ 《元史》卷一五二《赵柔传》。关于赵柔的籍贯,《元史》本传谓“涑水人”,《通志》《赵柔神道碑》则谓:“维赵氏奉圣州矾山人,天兵入中原,侯之祖考(赵柔)以易州总押统兵民七万来归,遂拜镇国上将军,易州军民太守,始家易之涑水。”见《滋溪文集》卷一七。

⑧ 元好问《严实神道碑》,《遗山先生文集》卷二六。

三

金廷和蒙古对汉人地主武装的态度和政策,加速了北方地主阶级政治上向背迥异的分化。

“在金叔世,宣宗蹙国播汴,河朔豪杰所在争起,倡纠义兵,完保其乡,金怵以官,冀赖其力复所失地”。^①对河朔汉人地主武装“牢笼用之”,“羁縻使之”,^②企图利用并依靠这个力量来“安反侧”,“备外兵”,“复失地”,^③这在金廷可以说是一贯的态度。只是利用依靠的程度和办法,前后略有不同。

金廷公开招集地主武装始于1215年。是年,同知太原府事古里甲石伦“奏请招集义军,设置长校,各立等差”。^④各等长校计有总领提控、都统、副统、万户、千户、谋克等。同年,知平阳府事兼河东南路兵马都总管胥鼎,也在所将“义军”中置“总领义军使副及弹压”。其目的是为了将所招集的汉人地主武装牢牢控制在金廷官方手中,为我所用,并对其“朋聚党植无所不至”的破坏行为“预为防闲,使有畏忌”。^⑤此后,加强控制的愿望虽未怎样见效,而总领提控、都统等,倒是成了拥有武装的汉人地主头目相当普遍的称号(当然,其中有些是授予的,大部则是自称的)。

就一部分汉人地主而言,他们乘乱争起,团结为兵的主要目的之一,是为了向金廷求官封,邀重赏,掇取富贵。安肃州苗道润贞

① 姚燧《荣祐神道碑》,《牧庵集》卷二二。

② 《金史》卷一〇七《高汝砺传》、卷一一八《苗道润传》。

③ 《金史》卷一〇五《张翰传》、卷一〇二《完颜弼传》;姚燧《荣祐神道碑》,《牧庵集》卷二二。

④ 《金史》卷一一一《古里甲石伦传》、卷一〇二《蒙古纲传》。

⑤ 《金史》卷一〇八《胥鼎传》。

祐初为河北“义军”队长，“比战有功，略定城邑，遣人诣南京求官封”。^①被任为宣武将军、同知顺天军节度使事。类似的情况不胜枚举。其中，象太原“义军”头目李天禄那样，谎报其所筹集的军数粮数，“视朝廷以己有兵粮，冀或见用，以取重职”^②的人，显然不在少数。

开始，金廷对于是否立即承认汉人地主武装在当地的势力，授以本处职任，颇为犹豫。当苗道润遣人诣南京求官封时，朝廷即曾提出这样的问题：“今即以其众使为将，肯终为我尽力乎？”^③也曾出现过这样的情况：“自兵乱之后，郡县官豪，多能纠集义徒，摧击土寇，朝廷虽授以本处职任，未几遣人代之矣。旧者人所素服，新者未必皆才，缓急之间，启衅败事。”^④有人甚至建议，“罢义军总领使副，以畀州县”。^⑤直至1218年春夏，朝廷仍然认为：“诸头目各制一方，利害至重，更审处之。”^⑥宰相高汝砺更是坚决反对“分地而与之州县”。^⑦太原失守，河北州县不能自立，金廷才于1219年三、四月下诏：河东、河北“州县官止令土著推其所爱者充，朝廷已授者，别议任使”。^⑧1220年二月，又进而封建河朔“九公”，^⑨“总帅本路兵马，署置官吏，征敛赋税，赏罚号令，得以便宜行之”。“除已画定

① 《金史》卷一一八《苗道润传》。

② 《金史》卷一一八《古里甲石伦传》。视，同示。

③ 《金史》卷一一八《苗道润传》。

④ 《金史》卷一〇七《张行信传》。

⑤ 《金史》卷一五《宣宗纪中》兴定元年四月庚申纪事。

⑥ 《金史》卷一五《宣宗纪中》兴定二年六月甲辰纪事。

⑦ 《金史》卷一〇七《高汝砺传》。

⑧ 《金史》卷一五《宣宗纪中》兴定三年四月甲申纪事。参照三月甲午纪事。

⑨ “九公”为：沧海公王福，河间公移刺众家奴，恒山公武仙，高阳公张甫，易水公靖安民，晋阳公郭文振，平阳公胡天作，上党公完颜开，东莒公燕宁。“初置公府，（张）开与恒山公武仙最强”（《金史》卷一一八《张开传》。张开，赐姓完颜氏）“同时九府，则富兵强，恒山最盛”（《金史》卷一一八《武仙传》）。

所管州县外,如能收复邻近州县者,亦听管属”。^①此后,遂一味以官赏来取得堡砦头目的效用了。

蒙古方面对“河朔豪杰”,即汉人地主武装,也是招集争取,“欲借之以成包举之势”^②。所谓“我国家初入中原,命太师国王招集豪杰,勘定未下城邑”,^③透露了其中的消息。

“河朔豪杰”举众降附,蒙古对之有一定条件和要求。一是要“纳质”。史秉直诣涿州军门降,木华黎以其长子天倪为万户,而质次子天安军中;^④张柔被俘,蒙古复其“旧职”,“质二亲于燕”;^⑤武仙附蒙古,“弟质于军中”;^⑥严实亦曾“遣子忠贞入质”。^⑦二是要“助军”。如史天倪先是“以万户统诸降卒从木华黎略地三关已南,至于东海”,继又选“清乐社”壮勇万人为“义兵”,号“清乐军”,以从兄天祥为先锋,从征辽东。^⑧其他降者大都相似。三是要“献户口”。史籍中类似“严实以三十万户归朝廷”,^⑨“诸将献户口各增数要利”^⑩的记载,触目皆是。四是要“纳贡赋”。李全降,时“全山东经理未定,而岁贡于大元者不缺,故外恭顺于宋以就钱粮,往往贸货输大元”。^⑪此外,“入觐”,“设驿”,似亦不可或缺,至于接受达鲁花赤监临,更是不容有丝毫迟疑。

只要这些条件和要求得到满足,汉人地主武装头目于降附之际,却能从蒙古统治者那里取得相当于唐之藩镇、汉之邦国的种种

① 《金史》卷一一八《苗道润传》。

② 元好问《严实神道碑》,《遗山先生文集》卷二六。

③ 苏天爵《郑澧神道碑》,《滋溪文稿》卷二〇。

④ 《元史》卷一四七《史枢传》传。

⑤ 王磐《张柔神道碑》,《畿辅通志》卷一六八。

⑥ 《元史》卷一一九《李鲁传》。

⑦ 《元史》卷一五二《张晋亨传》。

⑧ 《元史》卷一四七《史天倪传》。

⑨ 《元史》卷一五三《王玉汝传》。

⑩ 《元史》卷一四八《董俊传》。

⑪ 《宋史》卷四七七《李全传下》。

特权。“太祖徇地，北人能以州县下者，即以为守令，僚属听自置，罪得专杀”。^①“国家自开创以来，凡纳土及始命之臣，咸令世守”。^②“国初方事进取，所降下者，因以与之，自一社一民，各有所主，不相统属”。^③所指主要就是汉人地主武装。王义“率众以宁晋归”，“授宁晋令，兼赵州以南招抚使”；^④易州赵柔“以其众降”，“以柔为涿易二州长官”；^⑤段直“起泽，应得泽”，“为州长官廿余年”；^⑥济南张荣“举其兵与地纳款”，授“山东行尚书省、兼兵马都元帅、知济南府事”；^⑦李全据益都降，“悉以全境付之”。^⑧这对于“自图富贵”的汉人地主豪绅来说，诱惑力实在是很强烈的。

四

蒙古攻金战争，其胜负主要取决于双方军力、经济力和政治组织力的强弱，而北方地主阶级，特别是汉人地主武装的向背，却也起了相当巨大的作用。蒙古之所以能够比较稳定地占领河北、河东、山东地区，并进而渡河灭亡金朝，就是在争取日益众多的汉人地主武装依附的情况下，逐步肃清附金武装势力的结果。

中都路 河北东·西路

蒙古攻占中都初期，河北各地附金汉人地主武装一度颇形活

① 姚燧《高泽坟道碑》，《牧庵集》卷二五。

② 《元史》卷一二六《廉希宪传》。

③ 宋子贞《耶律楚材神道碑》，《元文类》卷五七。

④ 《元史》卷一五一《王义传》。

⑤ 《元史》卷一五二《赵柔传》。

⑥ 刘因《段直墓碑铭》，《静修先生文集》卷一六。

⑦ 《元史》卷一五〇《张荣传》。

⑧ 元好问《毕叔贤神道碑》，《遗山先生文集》卷三〇。

跃。中都路安肃苗道润“前后抚定五十余城”。^①河北东路景州张开“复河间府、沧、献等州并属县十有三”，又“复清州等十有一城”，^②王福、移刺众家奴、张甫、张进也所在攻占州县。河北西路威州武仙则控制了中山、真定府、沃、冀、威、镇宁、平定州，抱犊寨，栾城、南宫县等地。迫使木华黎从经略辽东前线抽调史天倪回师南征。

这些地主武装头目虽同受金封，彼此间却不断倾轧。苗道润先是与移刺铁哥、李琛不相能，继而与贾瑀互相攻击，1218年六月为贾瑀所杀。是时，张柔、靖安民“实分掌道润部众”。^③八月，蒙古军出紫荆口，张柔兵败被执，遂以众降。柔招集部曲，下雄、易、安、保诸州，破贾瑀，尽有其众。自东流塌徙治满城，与武仙反复争战，控制了“深、冀以北，真定以东三十余城”。^④“缘山反侧”鹿儿、和和、美女、檐车、堵墙、百峰、东西五峰，苑家、西水、军市川、姑姑塌、红花谷、闪堂、水谷、白虹、白家、野狸、狼山诸砦，^⑤也都相继降附。由此，张柔“威名震河朔”。^⑥

1216年秋，观州粮尽，张开徙军辉州，又徙潞州。1221年，移刺众家奴“所部州县皆不可守”，^⑦移屯信安，与张甫、张进合兵。“燕南雄霸数州，乃三关旧地，塘泺深阻，鞑兵不能入，金将张甫、张进据信安守之”，^⑧成为河北附金地主武装长期据守的唯一据点，直至

① 《金史》卷一一八《苗道润传》。苗道润，史逸其贯籍。《畿辅通志》卷一六八《古迹·陵墓》载苗道润墓在安肃县西南四十里，当是安肃人。安肃县属安肃州。

② 《金史》卷一四《宣宗纪上》贞祐四年二月纪事，四月癸巳纪事；卷一一八《张开传》。

③ 《金史》卷一一八《张甫传》。

④ 《元史》卷一四七《张柔传》。

⑤ 元好问《张柔勋德第二碑》，《遗山先生文集》卷二六；王鹗《张柔墓志》，《元朝名臣事略》卷六《万户张忠武王》引；郝经《何伯祥神道碑》，《郝文忠公文集》卷三五。

⑥ 王鹗《张柔墓志》，《元朝名臣事略》卷六《万户张忠武王》引。

⑦ 《金史》卷一一八《移刺众家奴传》。

⑧ 《两朝纲目备要》卷一五宁宗嘉定八年“是秋鞑鞑破潼关”条。

1230年才为阿尤鲁攻降。信安北距燕山仅一百八十里,但因只是困守孤城,于大局却影响不大。^①

蒙古凭借汉人地主武装同附金势力反复争夺的,是以真定为中心的滹沱河上游两岸地区。史天倪、张柔步步进逼,木华黎统率的蒙古军又濒临真定城下,武仙窘蹙,于1220年八月出降。蒙古以史天倪为河北西路兵马都元帅行府事,仙副之。“仙与史天倪俱治真定且六年,积不相能”,^②彼此不断侵占对方地盘,扩展自身实力。武仙虽已降附蒙古,却仍“遣其将卢秀、李伯祥率兵谋袭赵州,并取沥城”,^③对藁城,也“犹怀曩怨,数肆侵袭”,^④并“往来钞掠平阳、太原间,行路梗塞”。^⑤张柔副手贾辅也继续将兵略地,进逼真定,^⑥史天倪则借口“武仙之党据西山腰水、铁壁二寨以叛”,“直捣其巢穴,尽掩杀之”。^⑦“积不相能”的背后,各有投附蒙古和依附金朝的两派地主势力支撑,不单纯是个人间的争权夺利。

1225年二月,武仙杀史天倪,以真定反为金。一时“河朔诸郡,十九俱叛”,“南北裂分,危疑翻覆,势不容喘”,^⑧引起巨大震动和反响。但是,在河北地主阶级中,附金势力终究已是风前残烛,像董俊那样“乃心太庙,夷险一节”,^⑨死心塌地投附蒙古的人,逐渐占据优势。于是,“史氏之人与属县旁近豪杰纳天倪之弟天泽为主帅

① 1227年张柔自满城移军顺天,“以遏信安行剽之党”(元好问《顺天府营建记》,《遗山先生文集》卷三三),字鲁命“千户按札统大军驻河北备金”(《元史》卷一一九《孛鲁传》),都只能说明信安地位之要,不能说明其影响之大。

② 《金史》卷一一八《武仙传》。

③ 《元史》卷一五一《王义传》。

④ 李治《王善神道碑》,《常山贞石志》卷一五。

⑤ 《元史》卷一五一《杜丰传》。

⑥ 郝经《贾辅神道碑》,《郝文忠公文集》卷三五。

⑦ 《元史》卷一四七《史天倪传》。

⑧ 李治《董俊神道碑》,《赵振玉神道碑》,《畿辅通志》卷一七一、卷一七四。

⑨ 李治《董俊神道碑》,《畿辅通志》卷一七一。